

第八章

在“民国”初创的政治旋涡中

“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

武昌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对章太炎说来，思想上是缺乏准备的，或者说，是出乎意料的。

1911年10月11日清晨，章太炎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了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但是，他还“不遽信”^①，照常讲学。下午，他正在讲堂上“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②。武昌起义的消息是确实的了，可是，有没有胜利的把握呢？他还在观望。直到“闻湖南、江西相继反正”，他方才中断“讲业”^③。

他之所以如此，并不奇怪。在此之前，革命党人已经举行了多次起义与暴动，都失败了。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④，结果，也失败了。同盟会的一批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通过中部同盟会等组织，与长江流域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声息相通，积极酝酿发动新的起义。可是，光复会的领导人，如陶成章，这时却“立定主意，不为虚耗金钱之事，更不为无益之举，而虚耗其精神”，准备放弃武装暴动与起义，转而专心致志“多著几部历史、地理教科书，以益后进，而助教育精神之发挥”^⑤；如赵声，是致力于光复会与同盟会

①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三年辛亥。

② 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载《文汇报》，1957年4月13日。

③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三年辛亥。

④ 孙中山：《孙文学说》，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537页。

⑤ 陶成章：《致柱哥》，见《陶成章信札》，71页。



团结合作、一致行动的一位有威望的革命活动家，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便病死于香港。陶成章怀疑赵声被胡汉民等毒死，光复会与同盟会声气便重新隔绝。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光复会会长的章太炎同国内秘密进行的实际斗争的直接联系日渐减少。他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讲学与学术研究方面，这更减弱了他对政治形势的关注与对实际斗争的缜密思考。1911年9月15日出版的日文杂志《日本及日本人》所发表的章太炎访问记，记述了几个日本学者到“学林处”拜访章太炎时的所见所闻。他们在章太炎的住处看到的是：搁板上放着缩印本的《藏经》，书桌上放着两三部日文版的书籍，章太炎蓬头乱发，半裸着身体。他们听章太炎滔滔不绝所谈的，是《建立宗教论》的主旨，是法相教义与泰西哲理的比较研究，是“比量”与“现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是清朝史学的源流，是对孔教的批评，等等，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学识渊博，富于特创之见”、“安处陋巷，乐于其学”的杰出学者，而不是一个革命家。访问记后附录章太炎的《读〈灵魂论〉》，和这篇访问记一样，都反映了章太炎这时专注于学术而同实际斗争相当隔膜的状况。^①

武昌起义的胜利，将章太炎拉回到实际斗争中来，使他抛开了《庄子》、《说文》与法相教义，对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匆忙地去探究思索。

由于上海尚未光复，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在日本继续滞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积极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做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工作。

武昌起义后，留日的满族学生人心惶惶，思想相当混乱，有些人竟主张向日本借兵，以镇压革命。日本朝野一些人士也乘机大肆活动，企图利用他们，借机干涉。为此，章太炎立即写了一封致“满洲在东留学生诸君”的公开信，重申：“所谓民族革命者，本在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子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公开信还特别指出：“东方一二妄人，志在兼并他人土地，妄作莠言，以动贵政府之听……彼国旧交之域，无过高丽，今观彼国之待高丽，

^① 参见栖霞道人：《访章太炎》，见日文《日本及日本人》，第566号。



他日之于满洲可知也。贵政府一时惶恐，亦或堕其术中，君辈满洲平民，于此真无利益。”^① 这封公开信阐明了“排满”真义，对稳定满族留日学生情绪起了积极作用。它还表明，从武昌起义一开始，章太炎对日本朝野的动向便非常关注，一点也没有放松几年来在曲折的斗争中逐步养成的戒心。

10月下旬，章太炎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诛政党》，对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杨度、蒋智由、严复、马良、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派头面人物逐一给予猛烈的抨击与批判，揭露他们各为朋党，“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文章指出：“欧美政党贪婪竞选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及自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正因为如此，文章要人们千万不要寄希望于这样一些人物，更不要将他们的朋党与西方近代政党等量齐观，“托命此曹，亦犹鸱鸢之巢苇苕也”。章太炎认为，中国真正的近代政党建设与政党政治，都有待于革命成功以后。所以，文章中写道：“苟我夏齐民不忍亡其宗国，赫然振作以恢九服，中国既安，各依其见为政党，内审齐民之情，外察宇内之势，调和斟酌，以成政事而利国家，不亦休乎！”^② 这篇文章表明，直到这时，章太炎对立宪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仍深怀戒心，并要求人们对他们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这期间，章太炎还写了另外一篇重要文章，即为日本人平山周的《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一书所写的序言。这篇文章，号召革命党人深入研究会党的组织、要求、特征，并强调“今欲集合会党，非直因成法利导之也，又将参而伍之，去其泰甚，补其缺遗”^③。会党，正是革命党人历次起义所着重依靠的一支社会力量，也正是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党人所将继续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究竟应当怎样对待他们，章太炎在这里不仅要求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而且应当敢于正视他们的弱点，对他们积极加以领导。

这三篇文章表明，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最初那些日子里，章太炎对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答复，基本上继承了他主编《民报》以来

① 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见《革命逸史》，第5集，254~255页。

② 太炎：《诛政党》，载《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

③ 章炳麟：《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序》，见日文《日本及日本人》增刊，1911年11月。



的立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1月初，他从报上获悉孙中山即将回国，尽管前几年同孙中山有过不愉快的纷争，这时，从革命发展的全局考虑，他主动捐弃前嫌，自东京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说：“探悉大革命家孙君逸仙已于前日乘轮回国，不日即可抵埠，请贵处派员妥为招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① 这封电报说明，他这时所希望的仍是确立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领导中枢，以便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上海革命党人11月3日发动起义，7日建立上海军政府。章太炎一听到上海光复的消息，就动身回国。在为迎接孙中山给陈其美发了专电以后，他便带了十多名青年学子乘火车离开东京，11月11日上午10时在神户乘轮船离开了他已旅居了五年零四个月的日本。

在船上，章太炎同清藤幸七郎邂逅。清藤幸七郎是黑龙会重要成员，从同盟会一建立起就作为正式会员非常活跃地参与总部的事务，这时，奉黑龙会与玄洋社头目内田良平之命前往中国，正好与章太炎同船，立即探询章太炎对于时局发展的看法。章太炎同清藤幸七郎谈了他关于建立革命新政权的具体设想。根据清藤幸七郎写给内田良平的报告书，章太炎所谈的主要观点是：

我们还没有到达可以欢呼万岁的时候。前此发展虽然比较顺利，今后则必须准备遇到难关，需要费尽苦心去解决。目前已经光复的各省，还没有足孚众望的领袖人物，但是，由于形势在发展，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并非就造就不出。这种伟大人物，如果是华盛顿式的，那就要为中国庆幸；如果一旦是拿破仑式的，那就可能最终导致出现某种乱世。中国现在所适宜的，应是多头共和制度。法国式的统一的共和制，不适合于中国。无论如何，必须采取联邦制。如果不能洞察这必然趋势，潦草地企图将全国统一于完全的主权之下，稍有差错，就会导致内战，以至出现崩溃分裂的局面。^②

在这里，章太炎谈到了为什么应当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制共和国，而不可建立拿破仑式个人集权制共和国，这当然同他对起义各省实际状

^① 《章炳麟由东京致沪军都督电》，见《民国军政民政文牍合编》，第3集，上海，广益书局，1913。

^② 《报告在去中国的船上听到章炳麟革命意见的书信——清藤幸七郎致内田良平》（1911年11月11日），译自《北一辉著作集》，第3卷，178~179页，东京，1979。

况的观察和估计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他回国时关于建立中央政权的最初设想。

然而，一踏上国土，他就给卷进了复杂的纷争之中。一介书生，在纷争的旋涡中，在一大堆他所不熟悉不了解的实际问题面前，很快就迷惘起来。在各种势力的包围下，在一批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 的撺掇播弄下，他对问题不再能像前一阶段那样比较冷静地思考。于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都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他的初衷，而被纷争的旋涡裹挟着向前卷去。

章太炎是在 11 月 15 日回到上海的，轮船停泊在吴淞码头。16 日《民立报》专门发表了《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一文，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今章太炎已回国返沪矣，记者谨述数语以表欢迎之忱，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一般民众，起初确实将这位“七被追捕，三年禁狱”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当作大贤崇敬，每篇宣言一出，便当作金玉文章拜跪”^①，但实际上，章太炎从他一走下轮船踏板起，就已成了当时各派力量借以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一个砝码。

章太炎甫下船，是时自称吴淞都督的李燮和便把他接到吴淞军政分府之中。吴淞与上海市区近在咫尺，怎么建立了两个军政分府呢？原来，在上海策动起义过程中，中部同盟会的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曾进行了合作。11 月 3 日起义时，陈其美被清军扣押于江南制造局，李燮和率部猛攻，将制造局占领，救下陈其美，并使起义转败为胜。李燮和当时即被推举为临时总司令。可是，上海大局甫定，陈其美就乘李燮和疲极休息之时，联合地方绅士，自称都督，组织了沪军都督府，而将李燮和等光复会系统的人员排除在新政权之外。李燮和醒来之后，发现满城都已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布告，怒不可遏，本想率部攻陈，“惧为清虏笑，乃率众直走吴淞，亦称都督”^②。陈、李交恶，牵连而致使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章太炎在吴淞军政分府中听李燮和介绍了这些情况，感情上受到了很大刺激。一年多以前导致他和陶成章、李燮和等重建光复会的余痛犹在，不料在革命蓬勃发展的紧要关头，昔日的分歧演化成

① [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109 页，东京，圣纪书房，1941。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三年辛亥。上海光复时，身在汉阳的战时总司令黄兴曾致函李燮和，说：“沪事竟告成功，雄才佩甚。……沪事如何进取，乞卓裁主持，不必远商也。”（载《民立报》，1911 年 11 月 11 日）说明黄兴当时也曾认为应由李燮和主持沪事。



了激烈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权力之争。这时，大敌当前，章太炎不希望内部冲突激化起来，他想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旧日影响，“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①。然而，陈、李这番冲突实际上还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他建议李燮和带头去掉都督称号，而改称总司令，拥戴原江苏巡抚、苏州军政分府都督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李燮和于是立刻发表宣言，声称吴淞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②。这时，江苏南京等地尚未光复，已经光复的地方，即设置了上海、吴淞、苏州、镇江、江北五个都督，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章太炎劝告李燮和放弃都督称号，固然是为了以此行动来结束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但是，宁可选择程德全，而不愿支持陈其美，这不能不说是李、陈交恶在他的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作用。他的“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也就不可能不偏不倚，处处以革命事业自身的需要为重。

这时，已有十四省相继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扑灭革命，起用了袁世凯。11月16日，即在章太炎刚刚返国的时候，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一手控制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为了应付这一严重形势，起义各省迫切要求结束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局面，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以领导革命向纵深发展。在湖北都督黎元洪、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先后倡议下，11月15日，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湖南、上海、镇江七处代表齐集上海，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展开了紧张的筹组中央政权的工作。为了积极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章太炎经乌目山僧的专程迎迓，离开吴淞来到上海，住进了著名的爱俪园即哈同花园。

在返回阔别已久的上海后，章太炎从三个方面开展了紧张的活动。

其一，力主攻宁、援鄂、北伐。

南京，是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是清廷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治中心，江苏大部分地区光复以后，南京仍控制在清军手中。为了确保江、浙等省的安全，有效地支援武昌首义地区，攻宁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尽快攻占南京，章太炎在这一点上态度非常明确。他不仅动员李燮和尽快出兵，要李燮和赶赴南京前线督战，而且也亲自和宋教仁一道跑到南京城下巡视，激励将士勇猛攻战。12

① 《章炳麟致〈民立报〉社书》，载《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②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载《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月2日3时江浙联军乘夜攻占南京，章太炎立即领衔会同宋教仁、黄兴、程德全、陈其美、汤寿潜等致电江浙联军全体将士，说“东南大局，从此救平，谨祝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①。

就在攻占南京前几天，11月27日，汉阳失守。在是否应当坚决援鄂的问题上，章太炎同黄兴发生了争执。黄兴曾亲自指挥了壮烈的汉阳保卫战，汉阳失守后，他曾主张“放弃武昌，率所有精锐及饷精械弹乘舰东下，进取南京，以为根据，再图恢复”^②，遭到武昌诸将的反对。12月1日，他自武昌返抵上海，宣布“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之统一”^③，对援鄂持消极态度。是日，章太炎、陈其美、程德全同黄兴讨论军事行动的战略所向问题，章太炎在会上公开批评了黄兴的主张。章太炎自述，在会上，“余言江宁即下，当为援鄂计。克强称武昌绝地，赴援无益，不如北伐便。余言天时而寒，南军无裘褐，且兵寡，不能与北军相当，终当以援鄂以固根本”^④。第二天，南京光复，章太炎即领衔与宋教仁、黄兴致电镇江都督林述庆，说明“鄂事要紧，亟待应援”，要求他“进兵临淮，继图开封”，“既可进取，又可为援鄂之策应”^⑤。在这同时，他还建议陶成章：“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汤寿潜）乞千余人上援。”^⑥要陶成章亲自率军西上援鄂。

章太炎反对因汉阳失守而轻易地便放弃首义之区，这首先是因为他考虑到，那样做，将在政治上、士气上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不同意用空喊北伐来为弃鄂作掩护，因为当时并没有组织起北伐所需要的军力、物力、财力。在攻克南京前，他在南京尧化门前线同程德全规划克宁以后进行方略时，便已确认“进师北伐”与“派兵援鄂”同为必需。^⑦12月1日，他又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各都督府“急于秣马厉兵，刻期北伐”^⑧。12月5日，他又积极支持在沪成立“北伐联合会”，计划联合各省都督，共同北伐。这些事实说明，他在北伐问题上，态度也是积极的。

① 《攻克南京贺电》，载《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

②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110页，1948。

③ 《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

④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三年辛亥。

⑤ 《致镇江林都督电》，载《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

⑥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元年。

⑦ 参见《时报》，1911年12月2日。

⑧ 章太炎：《宣言六》，载《民国报》，1911年12月1日。



攻宁、援鄂、北伐，都是为了从军事上进一步打击清王朝，特别是东山再起的袁世凯。章太炎曾估计说：“至于清廷，既毫无势力，惟吾所欲为可耳。所足忧，袁一人而已。”^①袁世凯首先是凭借他所统率的北洋军事力量来同革命势力较量，也正因为如此，连章太炎这样的书生、学者，也来关注军事行动了。

其二，积极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努力推动已经“独立”的各地区、各派系力量的“联合”。

当章太炎回到上海时，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胡仰、胡纬、胡瑛、何海鸣、邹廓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以促进中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暂设临时外交总机关为宗旨”，要求“各省及各团体派代表二人赴会”^②。当章太炎住进爱俪园后，他们立即前来找到他，说明他们的打算，取得了章太炎的支持。11月21日，章太炎作为他们的首席赞成员，参加了他们在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的大会，并被推举为联合会章程的主要起草人。

与此同时，苏军都督程德全、苏军都督府财政部部长应德闳也发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大会。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四川云阳人，出身于一个穷秀才家庭，本人也只在国子监肄业。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举兵入侵中国东北，他正在黑龙江将军寿山帐下襄办军务，曾经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俄军大炮的炮口，阻止他们炮轰齐齐哈尔，在朝野之间博得盛誉。1905年后，相继任署理黑龙江将军、黑龙江巡抚、奉天巡抚，同沙俄交涉中多次据理力争，以挽回主权，还大力振兴实业，注意兴利除弊，在清末地方大吏中渐露头角。1910年，他调任江苏巡抚，经常站在立宪派一边，支持立宪派的政治要求，与江浙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人物张謇、沈恩孚等结纳甚深。1911年11月5日，他在苏州“反正”，主要也是为了适应立宪派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取得革命党人的信任，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他在应德闳的支持下，倡导成立中华民国联合大会，并准备在上海创办一份日报，作为自己的言论机关。为此，他派遣马叙伦在沪具体进行。章太炎让李燮和承认程德全为江苏都督，使程德全大为兴奋。马叙伦这时“便由应德闳给章先生

^① 盛先觉：《致任公先生书》（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1936。

^② 《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和程德全拉拢了”^①，一面请章太炎共同做中华民国联合大会的发起人，一面请章太炎担任即将出版的《大共和日报》社长。

11月20日，程德全与章太炎联名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了《为统一意见发起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宣言》，说：“当困居专制政体之下，其功在于破坏；而在今日已脱离旧政府之羁绊，所重尤在建设。”鉴于“吾国疆宇广阔，交通素未便利，各省语言不同，习尚互异，声气既多隔阂，心志间有未齐”，故“拟发起中华民国联合大会，附设言论机关，集合各省宏通达识之士，公同研究共和联邦政治与今时适用问题，发挥刊布，期以整一宗旨；并调查各省独立团体之情况，而监察其行为，庶以扶助共和政府之完全成立，而保亚洲和平之大局”。宣言之后，并附简章十则。同一天，他们还通电各地军政府及各独立团体，要求各地“公选驻省干事员四人”，以便专门联络通信。^②

章太炎既成了共和中国联合会发起者的首席赞成员，又成了中华民国联合大会的主要发起人，经他倡议，两家决定联合起来，并同意由章太炎亲自赴苏州接洽，在苏州原起草的章程基础上订出统一的章程。12月14日，章太炎手定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在《民立报》与《时报》等上海大报上同时刊布，规定该会“为联合全国一致进行起见，定名为中华民国联合会”，“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该会设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驻会干事每省一人，驻省干事每省四人，参议员每省二人，由驻会干事组成总务、会计、书记、交际、调查五科，分科办事。章程规定该会事务主要为四个方面：一、“对于各独立团体，如有妨碍共和之进行者，应联络各团体设法纠正之”；二、“对于中央政府及各都督府，凡关于充实兵力之事，应尽力协助之”；三、“对于政治、外交问题，得开会研究，条陈意见于政府”；四、“设《大共和报》为发表言论机关”。在这个章程上签名的首先是章太炎，以下为程德全、赵凤昌、张謇、唐文治、陈三立、黄云鹏、应德闳等人。

中华民国联合会的酝酿与筹备过程，实际上就是章太炎同江浙一带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合流的过程。先前，光复会主要在新学学生与会党中秘密活动，与江浙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力量并无多少直接接触。此前不久，章太炎在《诛政党》中还对他们专门加以讨伐；

^①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43页，上海，生活书店，1947。

^② 参见《时报》，1911年11月21日。



一个多月来政治风云的急遽变化，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尤其原立宪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宣言和投身光复、赞助共和的行动，加上他们对章太炎的赞颂、迎合、趋奉，使章太炎对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稍后一个时候，他在给张继、于右任的一封信中说：“资政院、咨议局人，不可称立宪党，立宪党亦与保皇党殊。……立宪党者，其间亦玉石不齐，与革命党相类。若夫愤国权之沦丧，哀行政之苛残，屈于满洲帝制之下，而不得不以君主立宪为名者，盖三分居二焉。今者民国成立，名分已移，安有屈强不悟，以崇戴大事为表帜者哉？”谈到自己对于原保皇党、立宪党人的态度时，他说：“曩日所以力排二党者，虑其为建虏用耳。今者虜胡已去，天下为公，虽无公旦之贤，握发吐哺，期于招延彦圣。若夫怀媚嫉之心，挟阴私之计，宁使人材蛰伏，邦国殄瘁，而必不可使一党居于势要者，非独仆所不为，亦愿诸君与同盟人深戒之也。”^①正是基于认识上、感情上这一变化，章太炎开始引这些先前的论敌与政敌为同志，视他们为自己所依靠的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而程德全和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当然也乐于有这样一位“革命元勋”来作他们的表帜与代言人，中华民国联合会由此便成了章太炎与他们协调意见，以共谋共和国建设方略的一个方便工具，而受到双方的重视，由双方共同努力来组建。

其三，倡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企图以这一原则指导中央临时政府的组建。

从一开始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起，分歧就出现了。武昌作为首义地区，成了一个中心；而上海，作为江浙一带人文荟萃之区，中部同盟会基地，东西南北交通枢纽，成了又一个中心。自从黎元洪、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等相继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出代表会商筹组政府后，一部分代表到了武昌，又一部分则到了上海，这一分歧便趋于表面化。11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承认武昌鄂军都督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但坚持代表联合会议仍然继续留驻上海，使中央政府事实上二元化。武昌方面对此提出异议，反对使府、会相隔数千里，上海方面终于同意各省代表西上赴鄂，但仍要求每省留下一人在沪“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②。

上海方面的态度，表现了对黎元洪的不信任，对原湖北咨议局

^① 《章太炎先生与张继、于右任二先生书》，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1日。

^②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243页。



的不信任，也表现了对原文学社、共进会成员的不信任。他们希望用种种借口，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乃至张謇等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这些做法，延缓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建立的时机，使已经光复的各省无法集中他们的力量同袁世凯相抗。

章太炎一回国，就主张“应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①。在其后十多天中，他又反复强调：“方今惟望早建政府，速推首领，则内部减一日之焚乱，外人少一日之覬觐。”为了尽速组成中央政府，他建议由黎元洪、黄兴为元帅、副元帅，“由首领委任内阁总理，总理组织内阁各部”^②。他并推举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由汤寿潜、蔡元培、张謇、伍廷芳分掌邮传、学部、财政、外交。他希望按照这一方案，组成既以革命党人为核心、又能团结各派力量的中央政权。

根据上述设想，当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召开后，12月2日，他又发电报给新当选的代表会议议长谭人凤，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③在他看来，同盟会也好，光复会也好，原先都是处在秘密状态的、人数相当有限的革命团体，他们在武昌起义以来的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了领导与核心作用，但是，仅仅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或者用立即扩大组织，将赞成革命与共和的人全部拉入革命党内的办法，造成“以一党组织政府”的局面，显然不符合当时各派力量配置的实际状况，也不利于促进各派力量的团结与合作，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早日组成。章太炎的这封电报，要求突破同盟会、光复会原先适应秘密活动而形成的必要界限，广泛地联合革命军大纛下的各派力量，组成统一政府，反映了他希望实现革命军大联合、及早建成统一的中央政权以与清廷及袁世凯相抗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不懂得，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作为中坚与核心，就不可能形成真正巩固的联合与团结。他的这封电报，非但没有促进革命军各派力量的真正统一，反而在革命党人内部增加了思想混乱，围绕着对待革命党、原立宪派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纷争与冲突。

①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7日。

② 章太炎：《宣言》一、四、六、九，载《民国报》，1911年12月1日。

③ 《神州日报》，1911年12月4日。



各省代表会议移到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并没有如章太炎所希望的那样就此在武昌建立起来。章太炎面临着又一个为阻挠武昌中央政权建立而施展的政治手腕。他挣扎着，抗拒着。然而，他非但没有能够改变这一局面，连他本人，终于也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而逐步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江浙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合流。

12月2日，章太炎应邀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共商临时政府组建问题。在会上，黄兴力主设于南京，章太炎坚持“以武昌为都城，以金陵为陪都”。他本希望得到程德全、汤寿潜的支持，不料他们在会上“瘖口结舌”，“慎于发言”。会后，他专门给在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甚有影响的赵凤昌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为主鄂“大宣法语，以觉邦人”^①。他不了解，赵凤昌等人正是反对定都武昌的幕后人物，他的信当然是一页废纸。

攻占南京的捷报，武昌吃紧的消息，使主张定都南京的意见一下子占了上风。12月4日，苏、浙、沪三都督邀集各省留沪代表紧急会议，要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推举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②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为人们所理睬。他只得退了一步，提议推举黎元洪为副元帅。这项决议总算为会议所通过。

上海这一决定，果然遭到聚集在汉口的代表们的激烈反对。12月7日，汉口会议决定：如另有人在沪联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但是，在移临时政府于南京这一点上，他们还是作了妥协，并同意将会议迁往南京，和留在上海的代表会合，共同完成政府的组建事宜。

就在这时，南北议和开始了。“以大总统饵袁世凯而推翻清室”的空气，早在章太炎回国前就已出现，这时越来越浓烈。在汉口召开的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说“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上海方面，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特别是与袁世凯关系很深的张謇、赵凤昌等，尤其积极。连黄兴也在12月9日复汪精卫、杨度的电报中表示，若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推翻清朝，“中

^① 章太炎：《致赵竹公函》，见《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三年。



华民国大统领一席，断举项城无疑”^①。在他们看来，一旦把袁世凯争取过来，那么，无论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还是真正实现全国统一，便都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这一想法，对章太炎显然产生了影响。这些天内他虽然未有公开的表示，但是，对于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不再在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17日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议决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他都不再表示异议，表明他已默认与袁世凯妥协的主张。1912年1月中旬，他在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说，这时“临时政府将设，群情允同；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名号既就，无所改图”^②，这反映了他将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所拟就的所谓政治解决方案，已当做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加以接受，故在组织中央政府问题上最终也和他们站到了一起。

从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算起，才两个多月；从离日返国、踏上吴淞江畔的土地算起，也才一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章太炎在政治上、思想上却已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折。革命的胜利发展来得过于突然，新的急遽发展着的形势，提出了一大堆平常的日子里所无法预料到的非常实际的问题。在权力与利益面前，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的纷争；立宪派和咨议局上层代表人物倒向革命与共和，同时又要求革命与统一沿着较为温和的路线发展；掌握清朝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袁世凯及其党羽、部属的“议和”要求及条件；如此等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整套预先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早就成熟的审慎的解决方案。章太炎，由于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由于他的声望，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广泛的社会影响，一回国，便给卷入了这些矛盾的旋涡中心。章太炎企图超越于所有派别、矛盾和冲突之上，“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然而，实际上，他绝没有，也不可能超然于这些纷争之外。他一住进哈同花园，就门庭若市，从都督、议长到各方面的名流，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各种力量都在把他拉向自己一边。受梁启超指使前来兜售“虚君共和”方案的盛先觉往哈同花园跑了几趟，便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觉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

① 黄兴：《致汪精卫、杨度电》，见《革命文牍类编》，第5册，上海，自由社，1912。

②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载《大中华》，第2卷第12期。